

朱正
序和跋

海豚文存



海豚出版社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序和跋 / 朱正著. -- 北京: 海豚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5110-0513-7

I. ①序… II. ①朱… III. ①序跋—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47160 号

总发行人: 俞晓群

总策划: 梁由之

责任编辑: 李忠孝

整体设计: 郑在勇 吴光前

出版: 海豚出版社

网址: <http://www.dolphin-books.com.cn>

地址: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编: 100037

电话: 010-68997480 (销售) 010-68998879 (总编室)

传真: 010-68993503

印刷: 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32 开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印张: 5.125

字数: 74 千字

版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110-0513-7

定价: 22.00 元

“海豚文存”小引

梁由之

俞晓群兄主政辽宁教育出版社期间，组织出版过“国学丛书”、“书趣文丛”、“新世纪万有文库”等书系，格局宏放，影响深远，创造了中国当代出版史的一段奇迹。沉潜蕴藉数年后，俞兄从沈阳到北京，出掌海豚出版社，重出江湖，不负初衷。短短一年多时间，赓续旧梦的“海豚书馆”六大系列已陆续面世三十余种，包罗万象，蔚为大观。他兀自意犹未尽，于是才有了“海豚文存”。

承俞兄抬爱，邀约我担任“海豚文存”总策划。即将出炉的“文存”是与“书馆”平行的一套书系，各具特色，相辅相成。相对而言，“文存”不作细致的划分，来路比较野，内容比较杂，不那么经院，不那么学术；若较诸新鲜感、冲击力和可读性，则容有一日之长，或将不遑多让。

有趣，有意思，是我衡量一切优秀书籍的两条标准。二者居其一，已属难得。如果兼而有之，即当馨香以祝，实属可遇而不可求。“海豚文存”每年拟出两辑，约十来本，大抵学界及文坛名宿与中生代的作品各占一半。都能做到坐一望二吗？得读者和时间说了算。

爰书数语，以引珠玉。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日

记于深圳天海楼

题 记

前些日子，梁由之先生来电话，说他接受俞晓群社长的邀约，为海豚出版社策划一套“海豚文存”，第一辑“三老集”，是给三个今年八十岁的老人各出一本书，承他不弃，我也是其中的一人。很是高兴，于是就编了这一本《序和跋》。

从1988年为戴晴的《梁漱溟 王实味 储安平》作序起，我历年给别人著作写的序跋不过这么一小册。平均起来，一年不过一篇多一点。写得少，首先是因为来找我写序跋的人就少。有人来找呢，如果书稿写的是我自己没有多少研究的领域，当然不能写；我不太同意作者意见的，也不能写；还有一条，自己干的是出版这一行，也不能给在我工作的出版社出的书来写：你如果要我写序，就请你拿到别家出版社去出。这大约要算是我的一种“洁癖”吧。此外呢，倒也没有别的忌讳了。我写了序跋的这些书，后来

大都出版了，有一本两本现在还没有出，以后总是要出的吧，也就把这些序跋编入这本集子里了。

让我写过序的书，记得的还有李南央编的《父母昨日书》（美国版）、于武臣兄的摄影集，匆忙间未能找到编入，他日找出，只好再编入另外的集子里去了。

我自己写的书上，大抵都有前言后记。为了避免重复，都没有编入本书。

当年要我作序的朋友，翹翔、遐之、润泉、琼芝、舒芜几位，都已经离开了人世，我很怀念他们。这一回我又看了看他们留下的足迹，我想说，他们是不虚此行了。

二〇一一年清明节朱正于长沙

目次

题记

- 1 戴晴《梁漱溟 王实味 储安平》序
- 7 王锡荣《鲁迅学发微》序
- 12 胡遐之《荒唐居诗词钞》序
- 16 《三家诗》序
- 21 黄昌勇《王实味传》序
- 30 邵燕祥《非神化》序
- 34 陈明远《吴祖光：1957》序
- 40 舒芜《我思，谁在》序
- 46 《新生备忘录》序
- 50 《李锐诗词本事》小引
- 52 张翅翔《西山漫忆》序
- 56 陈琼芝《生命之华——百年巴金》序

- 66 一个科技知识分子的命运 ——《饶敦朴纪念集》序
- 71 张翊翔《更能消几番风雨》序
- 77 《云天孤雁待春还》序
- 84 家书可征国史 ——叶圣陶叶至善《干校家书》序
- 96 吴永平《胡风舒芜关系史证》序
- 103 林开霞《一个受牵连者的自述》序
- 107 赵文滔《伤害》序
- 115 《俞润泉书信集》序
- 118 还给人们正常的生活 ——《革命时代的私人记忆》序
- 123 《李仁溥印存》序
- 126 吴永良《雨雪霏霏》增订本序
- 132 夏和顺《老报人新问题》序
- 140 赵文滔《木人的话》序
- 143 两个家庭的一个世纪 ——李荫国《走出炼狱》序
- 148 董每戡和他的时代 ——《董每戡集》跋

戴晴《梁漱溟 王实味 储安平》序

戴晴写过不少的人。活着的人和死了的人。现在她挑出其中的三人编成这本书。我不知道这是出于偶然还是深思之后的决定。反正我以为将这三个人编在一起是很有意思的事。他们三位，梁漱溟，储安平，王实味，是太不相同了。换一个角度看，他们又有太相同之处。

他们是太不相同了。梁漱溟是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的。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很深的造诣，也有很深的感情。他尊崇孔子，希望发扬光大孔子的学说，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吧，他的这种主张，不但共产主义者当然不能接受（瞿秋白在《猪八戒》一文中就调侃过他），就是受过欧风美雨洗礼的留学生也不会赞同。储安平就属于这种受过欧风美雨洗礼的知识分子。用1949年艾奇逊白皮书的用语，他大约可以算是民主个人主义者吧。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他在上海

编《观察》，抨击国民党的专制政治，为中国的民主化呼号。观察丛书里有一本他自己写的政论性游记《英国采风录》，时隔四十年，我已经记不起书里写的是些什么，还保存的印象是，他很赞赏费边主义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希望中国走上这样一条道路。储安平的这些观点，梁漱溟大约会嫌其太新，而在共产主义者看来，却又是一种过时的资产阶级思想了。当年毛泽东连续撰文评白皮书，就说民主个人主义者“是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提出了“教育他们”的任务。三个中间走得最远的是王实味，是个共产主义者，抗日战争时期跑到了延安。在当时的中国，这样三个人，可说是颇有代表性的。他们代表了三种不同的信念，三条不同的道路。怎样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有过各式各样的主张，但不论这些主张怎样千差万别，就大的方向来说都可以归入这三者。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太不相同了。假使曾经有机会让这三位坐到一起，各抒己见，讨论中国的命运与前途，恐怕会争得面红耳赤，谁也说服不了谁的吧。

然而他们又有非常相同之处。他们的这种不同，只不过像在一场接力赛跑中同队队员各自守候在自己的接力区里，

可是同属于一个队。这三位在清朝末年先后出生的人物，自幼感知到国家积贫积弱，人民无告无权，因而认识到中国必须变革，也必将变革。一种忧国之心促使他们担当起天下兴亡的责任，投身到变革中国的事业中来。由于各人的环境、影响、机遇的不同，他们的具体道路各各不同，目的都是为了中国，为了未来，为了中国的未来，却是相同的。而且，下定了这个决心之后，也都义无反顾，一往无前，如同屈大夫说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他们都为了坚持自己的信念，为了分担民族的苦难，付出了代价，这更是相同的了。

三人的结局，看来很不相同，座上客与阶下囚几乎是霄壤之别。如果我们能有通观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的眼光，就会认为政协委员这样的礼遇和斩立决这样的严刑都是不必怎样重视的。经过多少年历史的淘洗，这样的差别将会一年比一年更显出只不过是小小异，而他们的遭遇有大同者在，他们都有一个程度不同的平反问题。戴晴的书用充分的事实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横加在这三人头上的种种恶名、种种罪名都是不能成立的，都是污蔑不实之词。我不知道要经过怎样的法

律程序才算是办妥了平反的手续，但我相信，在本书读者的心目中，他们是平反了。人们读了这本书，对这几位为了中国而献身的中国志士仁人，当会奉上自己的崇敬和悼念，并不会去问他们的平反裁定书是不是已经批下来了。

说到平反，这里可以提出一个问题来：是给谁平反？1633年罗马教廷宗教裁判所审判了伽利略，因为他写了一本阐扬哥白尼日心说的书，被认为是异端邪说，判了他八年监禁。他倒是接受了这个判决，老实服刑去了（其实并不老实，他在狱中还在继续他的研究，还写出了新的著作，当然也是“邪说”）；可是地球不肯接受教皇的判决，它还在围着太阳转。早几年在报纸上看到罗马教廷公开宣布当年宗教裁判所对伽利略的审判是错误的，我不禁失笑：都过去三百多年了，有什么必要来清理这一宗积案呢。我辈无神论者不必说了，就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天主教徒中，还有几个人认为哥白尼伽利略论证的日心说是异端邪说呢？想一想就可以知道，教廷的这一举措，不是为伽利略平反，而是为教廷本身平反。伽利略作为一位伟大科学家的声誉，并不因为宗教裁判受到丝毫损害，完全不需要为他做任何恢复名誉的工

作。为了伽利略一案，需要在世界公众面前争取挽回名誉的，倒是罗马教廷本身。正像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他们，并没有什么“在天之灵”需要安慰。给他们恢复名誉，只不过表明，在苏共历史上，在社会主义历史上，虽然出现过斯大林，终究还是公正的，这样，就更加改善了苏共的形象，恢复了社会主义应有的声誉。

对戴晴这本书也应作如是观。她能够写这些人，能够在刊物上发表，还能够集印成册，正好表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政治环境的巨大改善。正如大家看见的，比起王实味的那篇终于送掉脑袋的文章来，戴晴这篇讲王实味的文章难道不是更刺激、更厉害、更不中听么。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他们为了探索中国的出路，献出了毕生的心力，直到头颅和热血，可是他们的任务至今还没有完成。这不是我在散布悲观论调。我们只要看看报纸，看看报上的提法就知道了。要争取小康水平，岂不是说连小康还没有达到么；要致力于四个现代化，岂不是说与现代国家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么。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呢？毛泽东说过：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那么好，我们就都来建设社会主义吧。怎样建设

呢？邓小平说：“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15页。）他还没有完全搞清楚，我就更是完全没有搞清楚了。不过我愿意不断地探索，就像本书中写的三个人都终其一生不倦地探索着一样，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写出了几个为了中国的执着的探求者，这就是戴晴这本书给我的教益。想来也必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读者会喜爱这本书的吧。

敬为小序。

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日于长沙

王锡荣《鲁迅学发微》序

听到锡荣兄的《鲁迅学发微》要出版了，很是高兴。他愿意有我的一篇序言，我想，他出书，我却得到一个发点议论的机会，就更是分外地高兴了。

我没有查考过，不知道“鲁迅学”一词是怎样用开头的。1981年我写过一篇《鲁迅研究是一门科学》，“鲁迅学”这个提法就更进了一步，主张鲁迅研究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我想，像“莎士比亚学”、“红学”都有了，当然应该有鲁迅学的。从几十年间那么多人作过那么多的研究来说，这“鲁迅学”其实是早已存在了。

鲁迅自己有过一个想法，以为可以通过对一些人物的介绍和研究，作一部中国人的“人史”，如英国嘉勒尔的《英雄及英雄崇拜》，美国亚瑟生的《伟人论》那样（见《准风月谈·晨凉漫记》）。这个想头是很有意思的。人们既是历

史的创造者又是历史的承受者，通过对人物的研究当然可以加深对历史的理解了。谁如果真要作一部二十世纪中国的“人史”，鲁迅就是非选不可的一个。他正好生活在中国社会和中国思想急剧变化的时代，他的遭遇，他的作品，深刻地反映了这种变化。这也就是几十年间人们有那么多兴趣研究他的最根本的原因吧。

不但鲁迅本人的遭遇和作品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对鲁迅的研究也反映出了时代的变化。时代是不断地进步，鲁迅研究的水平也是在不断进步的。出于礼貌，不说别人的书，就说我在1956年出版的那本《鲁迅传略》初版本吧，粗疏肤浅，一想起来就深觉惭愧。但是我不想作太多的自责。这粗疏肤浅，岂不正好是反映了当时研究界的一般水平么。我想，要是今天拿这部稿子去投稿，必定找不到愿意接受的出版社的。可是反过来想一想，如果当时就写出了我今天认识到的水平，恐怕当时也找不到出版者的。比方说吧，王元化先生在1988年的一篇文章里讲到鲁迅，说“直到他逝世前，才开始超脱左的思潮，显示了不同于《二心集》以来的那种局限性。表现了精神上新的升华。”（《思辩短简》，上海古

籍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90 页）指出《二心集》以来所受的思潮的影响对于鲁迅来说是一种局限性。不抱成见的研究者都会承认此说是符合鲁迅的实际的。也许还可以说，他对“国防文学”口号的反感，也同这种精神状态有关。假如我当年能有这样的见识，并且把它写出来，这书还能出来吗？所以这本书不但是反映了我当时的水平，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当时所允许达到的水平。近年来，我们读到了汪晖、钱理群、王富仁诸家的研究著作，很为他们的成就欣喜，也为鲁迅研究水平的提高欣喜，更为时代的进步欣喜。即小见大，从鲁迅研究这个学术活动的小小角落中，都能清晰地看到这种进步，真不能不对中国的前途充满着信心。

在鲁迅研究方面，锡荣的贡献是独特的。他从注释鲁迅日记后面的书帐入手，查明了许多鲁迅与书的关系问题。谁都知道，鲁迅之所以成为后来人们所看到的样子，同他读过些什么书，受到过哪些书的影响，关系极大。某一时期他的阅读兴趣在哪方面，常常可以作为了解他这一时期思想的觚标之一。正好，几十年中，鲁迅把他买了什么书和别人送他什么书都记在日记后面的书帐里。许多人都以为这书帐是值